

略评弗雷尔与哈贝马斯的认识论基础

何永成

(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弗雷尔和哈贝马斯都信奉“主体是对话发展的”这种批判理论,也都从元理论的角度阐释过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社会科学中有关认识论的纷争主要聚焦于两个极端: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而弗、哈两人的研究却游离于这两个极端,该类学术范式的变异立身于批判解释学的学科视阈。弗雷尔与哈贝马斯有关认识论的理论创见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对人类科学的认识;对批判逻辑这一转换过程的分析;基于对话与共识的真理理论;对交往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比较。

关键词: 元理论;认识论;对话;话语;批判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1-0023-06

弗雷尔(Freire)是巴西著名的成人教育家,他曾长期从事“第三世界”的文化培训工作,并提出了“积聚教育”与“批判教育”的观点。所谓的“积聚教育”,意指知识是机械式地积累而成的;而“批判教育”则暗示学习者理应成为经验知识分配的积极参与者。近年来,他又被划为与批判教育学有着深厚学科渊源的“政治课程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在行动研究、团体发展、卫生促进及社会工作等诸多领域起过相当的推动作用。较之弗雷尔在“第三世界”成人教育及边缘群体增权策略研究上所作的贡献,哈贝马斯(Habermas)往往被推崇为德国战后最具影响的哲学家及社会理论学家,他通过急剧重建及理论整合拓展了发轫于上世纪2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并提出了有别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行为理论”学说。他最大的影响在于人文科学,尤其是社会政治理论方面。虽然他的著作在教育哲学及课程理论领域也被广为引用,但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理论学家。可以说,弗、哈两人在学术焦点及研究风格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这无碍于他们在学术思想上达成一定程度的互补,因为他们都信奉“主体是对话发展的”这么一种批判理论。该理论摒弃了独白式先验性的主体学说,相反在主体间交往的语境里寻求认同、定位自我,并认为个体认同与发展只有在社会化的最佳条件下才能得以充分实现。纵观哈氏的“交往行为”、“道德发展”及“解放理性”等学说,以及弗氏的“解放教育学”、“文化行为观”等概念,我们都能发现该理论的学术脉络及其梳理痕迹。

另外,弗、哈两人都从“元理论”的角度阐释过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元理论”也称“关于理论的理论”,它为获取知识、开展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理论基础。“元理论”涉及社会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等三个方面。本文试从批判解释学的语境入手,来粗略评介弗雷尔与哈贝马斯在认识论上的几个基础问题:他们对人类科学的认识;他们对批判逻辑这一转换过程的分析;他们基于对话与共识的真理理论;他们对交往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比较。

收稿日期: 2007-06-26

作者简介: 何永成(1977-),男,浙江宁海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批判话语分析

一、理论背景综述

社会科学中有关认识论的纷争主要聚焦于两个极端：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19世纪的实证主义强调科学逻辑的统一，结果导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方法论界线上的模糊。古典实证主义捍卫自然科学的因果论模式，并把它视作一切研究的逻辑基础；而反实证主义则认为社会生活中“意义”与“意识”的角色定位对人们提出了严格要求，也即他们必需选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基于阐释性方法的研究范式。于是人们面临着两种研究范式的取舍：自然科学的归纳分析和人文科学基于古典解释学方法上的描述性阐释。弗、哈两人的研究游离于认识论的两个极端，他们认为这不足以抓住人类科学的本质。他们在维持人文科学特有地位的同时，并未否认因果关系在创设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这种范式的变异立身于“批判解释学”(critical hermeneutics)的研究视阈，旨在超越认识论的两个极端。面对主体客体的二元论范式，他们更强调知识是一种交际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能绝对优先地掌控某些知识，知识的拥有最终取决于竞争和对话。

他们对待人文科学的这种元理论框架完全是建构在“批判解释学”基础上的。“解释学”源于对《圣经》研究的方法论疑问，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译说，在当前文化文献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从研究取向来看，批判解释学在社会理论中往往变异为文化批判主义的意识批判^[1]。批判解释学反对因循守旧，也不完全相信研究者的自我报告或文本的本土化阐释。

批判解释学认为社会研究者及文化文献都必须面对一种偏离于日常现实的认知与经验，这种认知与经验将会帮助解读社会结构的制约与能动作用。同时，这种偏离也创设了一种对话语境，为个体的解放性反思奠定了潜在的基石。譬如，在一个传统的社群里，多生孩子的观念也许交织在完全想当然的意义网络中。但被告知“人口爆炸”这么一个社会现实后，一些成员可能会陷入反思，并对现存传统形成陌生化的认识，最终激发一种“批判”的过程（比如社群内展开辩论，或修改传统意义等）。

二、弗雷尔：知识的对话理论

（一）意识辩证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

从严格意义上说，弗雷尔所关注的并不是哲学或系统知识论层面的认识论。然而，他又的确从辩证法角度对认识论作过大量论述。迷惑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如何运用辩证法原理对社会现实作出历史性关联性阐释的。一方面，他把社会生活的辩证本体论假设为一组历史关系，个中要件只有放在社会整体里才能理解。这种审视法则很大程度上沿袭了黑格尔、马克思的传统范式，同时又为自己的学术聚焦提供了理论背景。而后，他也从未使用任何超越这一指导原则的术语对历史的“客观辩证法”作出特别的论述。譬如，有时他会借助辩证关系用革命理论去评说领导与大众的关系。有时他又认为皮亚杰(Piaget)的发展阶段说涉及辩证转变。

其实，他最关心变异的主体间关系与主客体关系以及它们对知识与学习的启示。他的这种方法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它拒绝在重要性上超越其它任何一对反义概念（诸如主体客体，思维存在，理论实践等）。否则，人的思维很容易陷入二元论的谬误，从而无法理解此类关系的辩证统一。在弗雷尔看来，当前的主客体关系缺失交际因子，客体往往被视作沉默的存在。但就认识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客体知识不可能具有实用价值。只不过，他排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的选用往往会与那些热衷于社会控制的权力群体搭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弗雷尔声称，社会知识的理想形式得益于主体间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于一

种参与性行动研究里所预设的交际过程中，当然这种主体间关系也不能忽视客观条件的限制。

（二）批判：意识提升与认知偏离

弗雷尔关心客观社会知识的滥用，他常把研究者的社会意识与获取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加以联结分析。他认为科学知识的习得离不开研究者的社会常识，并说“科学是除常识外我们能借以观察社会现实的深层次的批判思维”^[2]。这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批判意识到底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弗雷尔曾用“意识提升”（conscientization）一词一言以蔽之。他虽未提“解释学”，但他研究分析的认识论基础却深深植根于涉及意识生成的阐释过程中。他解释说，意识提升在于获取一种能以新颖优位的观点来看待现实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人们产生认知偏离，进而重新认识世界，最终迎来新意义的诞生。批判主义观点认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偏离能让个体更好地感知世界，并使缔造更美好世界的梦想成为现实”^[3]。

意识提升的过程涉及两类产生认知偏离的不同知识：一方面，它把有关社会运作的经验知识带进学习语境，这可谓批判意识的启蒙模式；另一类认知偏离能帮助发现隐藏于人类科学实践与社会运动中的某些理论，这非常适合用来解读目前的教育困境。得益于这些隐藏理论所开辟的研究视阈，弗雷尔的认识论宣称，学习者基于自身经历，并通过修正自我理解，能够创造出新的知识。在他看来，外界赋予的知识和学习者自身经历中潜在的知识生成了两类认知偏离，这两类认知偏离间的冲突逐渐升华为某种启蒙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意识提升”过程。

（三）真理：主体间辩证法

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科学活动中，弗雷尔认为理想的认识论都应建构在主体间的对话上。这种建构主义的观点暗隐知识是不断变化的，因而具有“历时性”，但学界的清高又或多或少地掩藏了知识的谦卑特性。其实，社会知识的对话基础正是科学哲学对话本质的写照。

（四）理性：外延与交往

知识有两类，一类为了达成交往，另一类为了寻求控制。它们塑造了两种理性，本质上类似于弗雷尔提出的积聚学习与批判学习。这种划分一定程度上借助了产业改革中的技术性方法，它注重外延而漠视主体间的交往。在弗雷尔的心目中，技术理性的无限扩张正是造成当代世界异化离间的本原因素。

综上所述，弗雷尔的认识论假设包括以下几方面：知识存在于主客体的统一中，这种统一最终取决于主体间的关系；批判解释学建构于认知偏离所引发的意识提升；科学真理生成于主体间的对话；交际理性区别于技术控制。

三、哈贝马斯：知识的话语理论

（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

哈贝马斯的知识观源于建构主义的真理理论，它把知识视为一种能在科学社团中达成临时共识的话语。从这个角度看，知识是由某些话语团体创造的，他们对知识的推论建立在“错误”原则上，他们坚称科学不是绝对的证明和确认过程，而是一种无休止的“假设”和“驳斥”过程。哈贝马斯认为一切知识的基础都是程序性的，它们都是推论过程的产物。他的这种元理论方法把真理看作话语的终端产物而不是理论与事实之间的某种对应。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不同于多数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思想，因为它宣称认知的建构特性不会使知识变得随意或不可靠。相反，它的建构及历史特性表明一切知识断论都存在可能出错的成分，这些知识断论随着新证据的出现及元

理论争论的展开而不断得到修正^[4]。简而言之,知识存在于主体间交往行为的一切过程中。

(二) 知识旨趣: 解放的知识

哈贝马斯早期认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认为知识的建构是以三种普世性的人类认知旨趣为导向的。知识不是与生就有的,它们是长期进化适应过程的一种结果。正是通过这种过程,人类才得以“人性化”。

另外,他抵制技术决定论。他说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开发大自然提供了巨大的潜能,但这不能全部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只是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在他看来,知识的三种旨趣由人类的不同成就所预设:经验分析知识(empirical-analytical knowledge)是推论归纳的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历史解释旨趣(historical-hermeneutic interest)与涉及意义译说的学科紧密相联;而批判解放旨趣(critical-emancipatory interest)则不满足于经验科学或给定的传统意义,它帮助人们洞察表达自然法则的统治关系。

这类僵化在人们意识中的关系原则上是可以改变的,这只不过是意识批判的程度问题,但人们必须考虑到自然法则间的联系往往会在法则所属人群的意识中引发一种反思^{[5]310}。这种批判反思过程,在本质上,与弗雷尔在“意识提升”概念中所提到的“认知偏离”是相似的。哈贝马斯早年也曾借用精神分析的类比来解释反思与认知偏离的关系。这种类比只是方法论上的创新,并不表明意识批判过程与精神分析实践的恒等。就像精神病人的理性化,受压迫者也遭受交往扭曲的痛苦,这种痛苦可通过诊疗式对话得以克服。但后来他又承认这一类比问题甚多,最重要的是,诊疗模式昭示了专家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话语互动早为业界所诟病。有鉴于此,近年来他提出了开放的交往模式,不再把意识批判的知识论看作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的高层级的真理形式。相反,他认为批判社会科学只是构建理性交往的另外一种学科表述。

(三) 真理的话语理论: 共识与理想言语

20世纪60年代晚期,哈贝马斯放弃了精神分析的类比,转而去构建一种交往行为共识。这种策略调整促使其研究焦点日趋明朗,哈氏批判性地沿袭了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Peirce)提出的科学及科学社团理论,进而提出了知识的对话本质。对皮尔斯来说,认识论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澄清理论的逻辑结构,而是要理解理论在生成恒久共识的话语社会里的源头。在哈氏看来,科学社团里的共识生成不是那些独白式的逻辑程序所能带来的,它最终取决于主体间的交往过程。诚然,知识不能沦落为形式程序,因为“它发端于社会主体间的符号互动”^{[5]137}。

哈氏对知识的有关论述主要体现在“行为”与“理论话语”的技术性划分上。这种划分类似于西方思维中涉及日常生活的“常识”态度与有关科学,现象反思及批判活动的“理论”态度之间的差异。在哈氏的理论范畴里,话语是交往的一种形式,为了达成暂时性的共识,交往方往往屈服于某种旨在产生更好论点的非强制力量。

这种论点表征着一种“理性共识”,它源自交往方对事实的尊重及争辩的敬畏,它对一切理性主体都是客观有效的。其实,科学家在抵制某种论点前总要要进行心理推理,而且每一个“共识”的诞生都要遭遇无数次的劫难,结果,科学创造的可能性便往往受制于一种内隐的“理想言语”(ideal speech)模式。“理想言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或然性容易使人接受哈氏整体理论策略中最常为人所误解的相关元素,因为一切真实的交往情境都充斥着冲突、旨趣及误解,于是当哈氏一提出建构真实“共识”的观点后,各种混淆是非的评论便接踵而来。但哈氏的“理想言语情境”昭示了社会实践的具体目标,也即,把世界变成一个研讨场所,人们搁置不对等的

权力关系，平等对话共求真理。它帮助人们脱离符号暴力的制约，生活在一个解放的社会里。再者，哈氏话语理论是伴随着话语体制化及欧洲现代化的进程而出现的，他借鉴了社会学家韦伯（Weber）的观点，认为世界的理性化是一种历史过程，他在话语理论框架里提出的“理性”概念预设了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普遍性的科学理解。

（四）理性：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

交往行为理论的中心观点在于划分了话语的两类基本形式——交往型与策略型。有鉴于此，哈贝马斯竭力解读技术手段的“工具”理性与终极目的或价值的“物质”理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此间，前者被科学经验主义定义为“认知工具理性”，而后者则与交往理性有着紧密联系。他说，“如果把确认的命题知识用于交往，我们就为理性的宽泛涵义作了很好的注解。其实，交往理性本身就承载着一种不受约束、欲求统一的共识。这种共识又带来了言语争辩的力量，参与方在争辩过程中受制于理性的相互关系，往往会摒弃己见，转而信服客观世界的统一以及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性”^[6]。可以说，知识的这种分类有助于人们理解技术控制的不同内涵，也使人认识到规范理性的实现不可能通过工具性手段来完成，相反它只能建构在对话的基础上。

概括而论，哈贝马斯的认识论思想涵盖了以下几点：知识源于交往行为的主体间对话；批判解释学缘起三类知识旨趣，其中的批判解放旨趣更是批判社会控制的强力工具；一种隐性的“理想言语模式”指引着话语团体的认知发展，最终生成了真理的共识理论；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差异是理解规范推理特征的关键。

四、结 语

纵观哈、弗两人的认识论思想，我们不难梳理出两点共识，一处分歧：弗雷尔的学习对话概念预设了哈贝马斯的三类知识旨趣；弗雷尔的“积聚”学习与“批判”学习之分则映衬了哈贝马斯的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但哈氏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语境差异，因而他更关注怎样把学习的对话原理直接应用到政治领域。

弗雷尔所提出的教学理论与实践如同哈贝马斯对知识旨趣的多重阐释，哈氏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经验分析知识，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不可或缺的动因；历史解释学的译说则是搜寻文化主题，建构主体间交往的基础；而批判解放视野更是提升批判意识的前提条件。弗雷尔的认识论思想基于两类行为理性：操纵策略与对话关系，前者把人视为可被技术控制的客体，而后者则创设了主体间的共同参与，互助学习。这与哈贝马斯两种理性形式的划分如出一辙，哈氏认为，策略理性旨在达成工具理性对自然与人的控制，而交往行为重视主体间的相互理解。

在哈、弗看来，实践有“启蒙机制”与“直接政治抗争”两类语境。然而，两者在对待语境关系上却表露出了很大分歧。哈氏强调语境间的差异，他说：“当教育活动在反思与洞察的过程中不断前进时，机构若需实施某种政治行为必须要事先进行策略性的考量。”^[7]从这个角度来说，机构问题显得很不确定，从而反思模式也不能直接应用于其中。相比之下，弗雷尔则主张以革命领导的名义尝试把学习的对话原理直接延伸到政治领域。

参考文献

- [1] Ricoeur P.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58.
- [2] Freire P. A Pedagogy for Liberation: Dialogues on Transforming Education [M]. South Hadley: Bergin & Garvey,

1987: 106.

[3] Freire P. Letters to Cristina: Reflections on My Life and Work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87.

[4] Dreitzel H. Recent Sociology [M].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114-148.

[5] Habermas J.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M]. Boston: Beacon, 1971.

[6] Habermas J.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M]. Boston: Beacon, 1984: 10.

[7] Habermas J. Theory and Practice [M]. Boston: Beacon, 1973: 39.

On Habermas and Freire's Epistemology

HE Yongc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Freire and Habermas share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dialogical and developmental subject. Meantime, both of them approach the issu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theory. As is known, disputes over epistemology in social sciences mainly resolve around positivism and anti-positivism. However, the studies conducted by Freire and Habermas both deviate from these two extremes, which leads to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light of critical hermeneutics. All in all, Habermas and Freire's epistemology roughly covers the following theme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sciences; their analysis of the logic of critique as a transformative process; their theory of truth grounded in dialogue and consensus; and their contrast between communicative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Key words: Metatheory; Epistemology; Dialogue; Discourse; Critical hermeneutics

(编辑: 李颖)